屠基远:数度潜伏的革命战士(下)+ 屬賴

再度潜伏 迎接解放

工运领导人张祺、陈公琪等知 道父亲屠基远在商务印书馆时认识 王先青,遂决定让父亲去找王先青, 打入国民党内部。王先青是上海市 商会里的国民党市党部委员,又是 杜月笙的徒弟。他将父亲介绍给当 时的卢湾区区长章鹏若。1946到 1947年、父亲打入上海卢湾区民政 局.任户政股主任。他曾为地下党提 供过各种"身份"证件,并随时向党 组织报告敌人内部动态。不久党组 织又决定父亲去"竞选"伪区长,虽 然没有成功,但暗中扩大了党的影 响。父亲先后派两个党的外围积极 分子黄继茂、朱钟麟打入区公所, 1946年发展黄继茂入党。但不久被

1947年10月,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下令逮捕父亲。父亲在组织的安排下,及时隐蔽,避开了敌人的搜捕,辗转南京。党组织派毛齐华转交给父亲路费和联络关系,将父亲派往香港。

1949年2月,上海解放前夕,张 祺再次要求父亲潜回上海,负责国 民党民政系统的秘密接管和组织工 作。父亲冒着生命危险回到上海,找 到了仍在民政部门工作的朱钟麟等 人,了解情况后,布置他们收集民政 局及各区局的名单、地图、资料,将 "约法八章"等党的文件,分别寄送 给各区人员,进行政策宣传,并要求 他们保证户籍册完整等待接管。他 每周要同这些人员秘密联系二三 次,了解工作情况和国民党动态,然 后再编制宣传内容,派已被策反的 一批国民党政府的公务人员去印 发。当时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国民党 每天在杀人,用重金悬赏鼓动保甲长搜捕共产党人。这些被策反过来的国民党政府人员都是冒着杀头的危险,为上海解放做了很多工作。国民党逃离上海前夕,下令烧毁户籍册及破坏身份证存根,但在党的政策的感召下,很多职员自觉出来保护,保全了30个区的400万市民的户籍资料和一大批重要的敌伪档案,为新上海的民政建设做出了贡献。

当时父亲是秘密到沪,既不能同家人联系,又不能在公开场合露面。4月到5月,父亲住在周祥生家里,当时苏州无锡已经解放,父亲谎称是从苏州逃出来的。在周家,父亲对周祥生和爱人鲍颜和进行教育,要他们为革命贡献力量。他俩也千方百计地掩护我父亲,直到5月25日上海苏州河南部地区解放。解放后,他俩都人了党。

上海解放后,父亲又穿上了军装,成为军管会的政务接管委员会秘书主任,参与接管30个区的民政局、参议会。6月下旬,上海市人民政府民政局成立,曹漫之任局长,黄序周任副局长,父亲为秘书主任,1950年5月被提升为副局长。

"潘案"蒙冤"文革"磨难

建国初期,父亲兼任市政法委里弄工作委员会主任。他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充分利用积累的社会人脉,和他的同志们一起创建了上海城市居委会——"里弄政权"建设的治理模式,其中的工作原理至今还在沿田

自1950年起,遍布上海的11155 条里弄逐步建立了居民委员会。到 1954年1月,全市共有居民委员会 1847个,居民小组约有3.6万个,居



■ 1943 年,屠基远夫妇合影

民委员会委员95284人,形成了一个 自上而下的覆盖到社会基层的组织 网络。

父亲写的《城市居民委员会工作》一书,从主导思想到组织结构、地位、性质、任务及人员配备、工作方式、经费筹措等,都有详尽缜密的论述。该书是我国群众基层自治组织的第一部专著。

之后,他调任市政协副秘书长。 谁知,厄运也随之到来。1961年,父 亲被停职了,说是和"潘汉年案"有 关。后来才知道,其实是莫须有的所谓的"历史问题":父亲在地下党的 时候,打入国民党内部,奉党组织之 命竞选卢湾区长,兼任了20多天的 国民党区分部的书记,但没有去上 任过。这一情况已及时向党组织汇报 过,想不到却成为"历史问题","文 革"中还作为所谓"大叛徒"罪证。 父亲在家里赋闲了两年,但他很乐观。他经常用"李越、李禹、寄园、屠扶、李更生"等笔名,为《新民晚报》等报刊写杂文,既以此打发日子,又可用稿费来贴补已经很清贫的大家庭。

两年后,审查仍没有结果。父亲打报告给市委,要求到基层第一线去工作。结果组织上安排他到一〇一军工厂去做副厂长,组织部说是担任副职锻炼,随时上调回市里。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全家都为他高兴。父亲在这个厂里努力工作,很快取得了成效。一〇一厂成为全市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先进集体,《解放日报》发表了整版文章予以宣传。

正当市委准备调他同市里工作 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又 被作为厂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 权派"。曹到诰反派的轮番批斗。大 标语刷到了我们家的门口。那年的 夏秋之际,我们家来了两卡车的手 持尖刀铁棍、头戴藤帽的"红卫兵" "造反派",他们冲入我家,要抓走我 父亲。当时,我被吓得不轻。整个家 被抄得一塌糊涂,被搜查出的最严 重的"罪证",是父亲当年在抗日根 据地带回来的一把"三八式"刺刀和 几颗子弹,还有就是当时还值钱的 红木家具。这些人的粗暴抄家,激起 了我二哥及其同学的反感, 争吵之 下,还发生了对抗。张春桥对此事很 恼火,他在文化广场的一次会议上, 专门提到我父亲屠基远,说他是走 资派在挑动群众武斗, 因此父亲被 '隔离审查"受迫害3年多。

1970年,在我要去黑龙江插队 落户之前,我到江宁路的一○一厂 去看望关在"牛棚"里的父亲。我在 那间阴沉的"走资派隔离室"里,见 到了被关了两年多的父亲,他用颤抖的手抚摩着我细细的小手。我眼前的这个父亲已经不是那个潇洒的领导干部,而更像一位苍老困惑的囚犯。他说我的手臂那么细,怎么能到那么远的黑龙江去呀。说完,他把他在隔离室里省下的20元香烟钱塞给了我。我的三姐(当时已经在崇明前哨农场劳动)在一旁,看到此情景,禁不住失声痛哭。

"文革"结束后,父亲的历史问题被彻底平反。他在1980年担任市侨办副主任(主持侨办工作)。年满60岁后,父亲主动让贤,离开了工作岗位。

父母对我们子女的教育是非常 成功的,他们从来没有打骂讨孩子, 计我们自由地发展。记得小时候,我 们家里还出过墙报,家里的人都喜 欢画画写文章。我画的画得过少年 宫二等奖。当时,我们家生活是很艰 苦的。有八个孩子同时要付学费,其 中两个在北京读大学, 三个分别在 几所中学住读,还要赡养苏州的外 婆以及大舅朱钟麟留下的四个孤 儿。这些开销全靠父亲的工资。每到 付学费的日子里, 父母只好卖掉家 里值钱的东西, 比如家中祖传下来 的一些古医书、银具等东西,再加上 父亲的一点稿费,再不行,就只能到 处借钱。在三年困难时期,母亲经常 去市府机关食堂与他们商量, 让我 们几个孩子免付搭伙费。记得那时 我们到食堂吃饭, 总是买最便宜的 菜吃,从来不买排骨、红烧肉,所以 我们兄弟几个长得都很瘦小。

1998年1月19日,父亲走完了他不平坦的人生道路。但他对我们的殷切教导,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间。 摘自《上海滩》

一生一首翰墨诗 ——周慧珺传

产静 张亚圣

十八、书坛回春 1972年,一个重大的转折即将改变上海书坛的发展轨迹,预示着书法运动的复兴。那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毛主席在接见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发表了关于"学一点历史,学一点哲学,学一点书法"的讲话,并赠给随同田中来华访问的日本外相太平正芳一本怀素《自叙帖》的影印本,堪

说到那个时段的中日书法交流活动,就不得不论及日本书法在这百十来年的精进。大家知道,中国书法是日本"书道"的母源,这是毋庸置疑的。在江户时代之前,古代日本人称书法为"人木道"或"笔道"。西晋年间,一个名叫王仁的百济国(今朝鲜半岛一部分)使者扬帆渡海来到了日本,被日本天皇任命为皇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随同进献了孔子的《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等书籍,作为皇子的教村,这些系统的汉字和汉文的典籍使日本人第一次接触到了中国的书法。此后中国的汉字在日本生根发芽,书道初见流行。

到了明治维新时期,诞生了日本近代 书道的泰斗级人物日下部鹤鸣以及岩谷一 六、松田雪柯和稍晚时期的中林梧竹、西川 春洞、宫岛咏士、北方心泉等。明治十三 年,也就是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我国 著名的金石书法家杨守敬东渡日本,随身 带去汉魏六朝隋唐碑版无算,日下部鹤鸣 以及岩谷一六听闻后,多次到清国公使馆 中与其观碑笔谈,彻夜不休,因而顿悟,风 格大变。

这些日本书道家们以及他们的再传弟子在中国近代书法的基础上扬长补短、兼容并蓄,注重行草、篆隶,交构成了日本近代书道的中流砥柱,成为日本近代书法的先驱开拓者。因此,在漫漫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日本书道有其自身文化的渗入与承转,但中国书法始终扮演着其精神导师的角色,导领

着日本书道的前进方向。

但历史是在不断向前发展的,不 进则退。中国书法在近代已有所衰弱,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更是裹足不 前。

据周志高回忆:"自1972年开始,

就有日本人到上海参观旅游。因工作关系,我接触到大量日本人,对中国书法,他们有两个基本观点:一,他们认为中国是书法的母国,对古代书法家非常崇拜,对《兰亭》等书法名胜也很向往;二,他们认为当代中国落后,穷,书法在走下坡路。他们看不起中国的书法家,甚至放言,如果中国想把书法搞上去,就得去日本学习,他们那里有研究生和博士生。态度很懒慢。"

此情此景正是当时最真实的文化写照, 联系起毛主席要求"学一点书法"和他老人家 一贯不服输的倔强气概,此中的深意也就不 难理解了。于是,政策的相对宽松也就极大地 释放了学书者的创作热情,引发了持续十数 年的"书法热"。

同年,书法家徐伯清(1925—2010)敢为 天下先,大胆尝试举办书法展览。在其积极斡旋下,上海画院和南市区文化馆、园林局共同 在蓬莱公园举办了书法展,引起了广大书法 爱好者的热议。之所以要提这次展览,在于这 是"文革"以来上海书坛影响最为广泛、质量最为一流的全市性书法展览。

展览会由王个簃老先生题写"书法展览会"隶书匾额,延请胡问遂手书楷书前言,同时集中展示了任政、赵冷月、单晓天、翁闿运、徐伯清、周慧珺、吴建贤等一大批沪上知名大师及中青年优秀书家的一百多幅作品。参观者蜂拥而至,数日不绝。

1974年,蓬莱公园又举办了一次书画展览会,除了书法家外,还云集了刘海粟、陆俨少、程十发、关良等名师画作。这两次高质量的书画展览会使得当时的蓬莱公园声名鹊起,为大众百姓提供了一个欣赏艺术、欣赏美的公共场所。

经历了一系列的展览、展示后,周慧珺也凭藉出挑的书艺在青年书法家中小有名气,受到了出版刊物的瞩目,《人民中国》就刊登了周慧珺书写的行书——杜牧《山

5.英国政府正式出兵中国

按照林则徐预定的禁烟策略,是只禁绝非法的鸦片贸易,决不牵涉到其他一切合法贸易;因此他不但允许英国以外的其他各国商人具结进口,就是以前经营鸦片贸易的英国商人,只要能悔悟自新,同样允许他们具结进口。林则徐的这个策略是完全正确可行的,也是行之有效的:但不料道光帝得到九龙、穿

鼻数次战胜的奏报后,竟下令永远停止与英人通商,将所有英国商船尽行驱逐出口;林则徐当然不敢违抗道光帝的意旨,令自12月6日起封闭口岸,断绝中英两国通商关系。虽然查理义律以后又曾具禀请求恢复通商,林则徐仍不得不予以严词拒绝。道光帝甚至以为禁烟事了,改任林则徐为两广总督,调邓廷桢为闽浙总督。

道光帝这种错误的指导方针,主要仍是根源于清朝统治者一贯妄自尊大和盲目排外的闭关主义思想;它不但破坏了林则徐的禁烟策略,更导致和扩大了战争的危机。当时甚至还有代表极端闭关主义思想的大官僚曾望颜(顺天府尹),奏请恢复执行海禁,连英国以外的其他各国商船也一

律不准进口贸易;幸而林则徐据理驳斥,这种荒谬的主张才没有见诸实行;因此战争仅限于中英两国,没有扩大到其他国家。

当1839年(道光十九年)3月广东禁烟运动刚起时,英国政府还力求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并训令查理义律不得轻举妄动;以后因查理义律数次请求政府出兵中国,又自率兵船径向广东水师挑衅,中英两国事实上早已进入战争状态;更加清朝政府下令封闭广州口岸,断绝中英通商关系,严重损害了英国的利益,英国政府这才决定派遣侵略军前来中国。

1840年2月,英国政府任命查理义律为对华全权外交代表,又派乔治义律(George Elliot)为侵略军司令,4月向国会提出军费支付案。当时国会议员中多有反对出兵中国的,他们认为因鸦片问题而向中国开战,是一件极不名誉的事情;主张政府自动禁绝不名誉的鸦片贸易,并和鸦片商人断绝关系。但政府当局提出出兵理由,一为报复

中国对英国领事和英国的侮辱,二为赔偿 英商所受损失,三为保障英商身体财产的 安全,而对鸦片贸易应否禁止一事,完全不 加考虑。经过国会三天的激烈辩论之后,终 于仅以九票的多数通过了军费支付案,正 式出兵中国。

英国侵略军系调集原驻印度和南非的 陆海军组成;陆军由乔治义律率领,海军由

伯麦(James John Gordon Bremar)率领,计兵船二十六只,兵士四千人,于6月间驶抵广东沿海。广东方面,林则徐早就料到战争无法避免,英军将要进攻广州,所以在军事上已有适当布置。除了在粤江口内安设木排铁练、添置炮台炮位以外,并自葡萄牙、美国购进五千斤至八九千斤大炮两百多门,排列内河两岸;又整顿水陆两军和募集水勇五千人,日夜演习海上攻防战事。

战争开始以后,林则徐更广泛 发动民众反抗英国侵略军。一面组 织乡勇守卫本土,一面悬赏奖励民 众杀敌,约定如英兵登陆,允许人人 持刀痛杀,赏格是每杀死英兵一名 赏银洋一百元。

在这种情形之下,英国侵略军在广东方面无机可乘,就改向中国北部行动。全军除留一小部分封锁粤江口、阻止船只进出外,其余在6月底由查理义律偕同乔治义律率领沿海北犯。

当英国侵略军到达广州时,林则徐就曾 赶速通知沿海各省注意,道光帝得奏,也曾 令各省督抚严防。不过这些督抚,除了闽浙 总督邓廷桢属于抵抗派以外,像直隶(今河 北省)总督琦善、两江总督伊里布是投降派 的首领,还有的多是封建腐朽官僚。因此从 浙江到直隶海岸数千里,竟毫无防守准备。 定海等海岛不必讲,就连距离首都北京极近 的天津,防兵也不过八百人左右。

英军在7月2日同时驶抵厦门和定海两处海面。厦门方面,经邓廷桢督水勇迎战,英军不久即行退去。定海方面,英军于7月4日致书定海知县姚怀祥,限一小时内献地投降,7月5日就迳行攻占。7月28日英军又自定海北犯,8月11日驶抵大沽口外。



战